

Labor Economics Studies in China: 1978–2018

中国劳动经济学40年

(1978–2018)

杨伟国 高文书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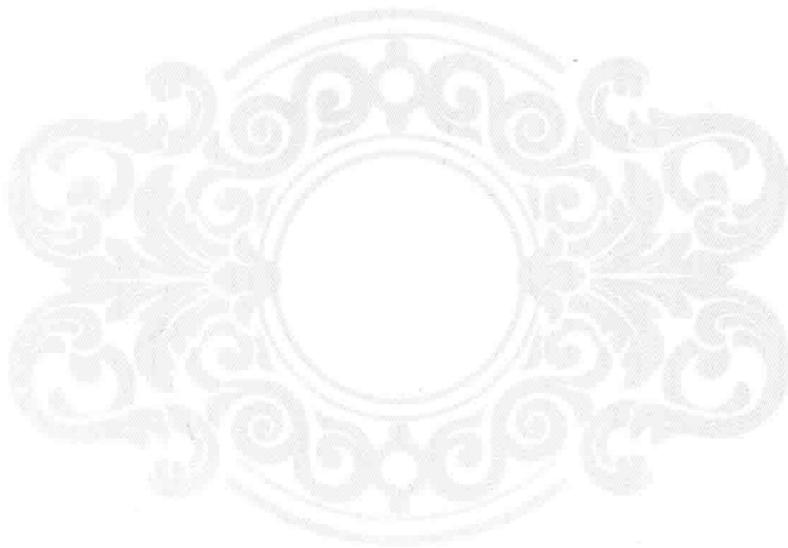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Labor Economics Studies in China: 1978–2018

中国劳动经济学40年

(1978-2018)

杨伟国 高文书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劳动经济学 40 年:1978—2018/杨伟国, 高文书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 -7 -5203 -3752 -6

I. ①中… II. ①杨… ②高… III. ①劳动经济学—中国—文集
IV. ①F24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963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侯苗苗 桑诗慧

责任校对 李 剑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①

劳动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事关国计民生。劳动经济是指劳动力的培养、提供、配置、使用和权益保障等一系列运行过程，涉及人口、教育、健康、培训、就业、失业、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社会保险等诸多内容，是国民经济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领域。劳动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劳动力的可持续供给、劳动者素质的不断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劳动者工资和生活的有效保障、劳动者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不断改善、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以及劳动者工作效率和满意度不断提升。由于劳动经济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意义上，劳动经济就是民生经济，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极为重要。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劳动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显著优化，就业质量显著提高，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中国劳动经济的发展，为劳动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催生出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研究成果；同时，中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劳动经济的发展。

纵观过去 40 年的发展，中国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仅完全涵盖了劳动经济学的传统领域，如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工资、人力资本投资、歧视、工会、劳动力市场监管等，还拓展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贸易与就业、人口红利、刘易斯转折点、营养与健康等诸多新兴领域，并逐渐从微观走向宏观，逐渐走出一条贯穿微观和宏观经济分析的路子。中国劳动经济学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其专注和研究的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过

^① 杨伟国，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德国劳动研究所（IZA）研究员；高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学科发展突飞猛进，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研究成果对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劳动经济学的教学单位、科研机构、学术刊物和学术团体更是获得巨大发展。众多高等院校开设了劳动经济专业，招收和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一些高校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劳动经济学院，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我国还先后成立了专门的劳动经济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等。劳动经济的专业学术刊物也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发展到目前的《劳动经济研究》《人口与经济》等百花齐放的格局。2016 年 5 月，劳动经济学会正式成立，中国劳动经济学界又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

此外，从研究方法上看，中国劳动经济学界已经从初期的简单描述分析，发展到注重调查和实证研究，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得到普遍应用。而且，中国劳动经济学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长期微观调查数据，如北京大学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hina Urban Labor Survey, CULS）、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 CHIP）等，为中国劳动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数据。

应该说，40 年来中国的劳动经济学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仅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对等交流，还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内容体系。

本书以中国劳动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主线，从就业与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工资决定、工资差距、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市场运行等方面，综述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学术界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描述相关研究的进展、创新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书作者均长期从事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熟悉中国劳动经济的实践与政策，对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有较好的掌握，能够将劳动经济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进行阐述。希望本书能够反映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劳动经济研究的主要脉络和基本观点，但由于时间有限，有些问题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述。本书主编和各章作者限于水平，书中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就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进展	1
第一节 就业优先战略的确立和发展	1
第二节 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性的探讨	4
第三节 关于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讨论	7
第四节 对延迟退休和生育政策调整就业效应的关注	10
第五节 新经济对中国就业影响的研究	14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弹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2
第一节 就业弹性的研究概况	22
第二节 就业弹性测算及其变动趋势的研究	24
第三节 关于就业变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	27
第四节 就业弹性的影响因素体现了经济发展的阶段特色	30
第五节 就业弹性估算方法的不断完善	32
第六节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34
第三章 中国灵活就业问题研究进展	42
第一节 灵活就业概念的探讨	43
第二节 灵活就业形成机理的分析	48
第三节 灵活就业的统计与测度	52
第四节 灵活就业工资和收入差距的研究	57
第五节 灵活就业管理与政策的研究	59
第六节 未来研究方向	63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研究	70
第一节 中国劳动力流动基本历程	70
第二节 中国人口流动与人口空间分布	77
第三节 中国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	79
第四节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	81
第五节 中国人口流动的新趋势	83
第五章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研究	90
第一节 在改革开放中走出的中国特色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道路	91
第二节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的演进及 特点	96
第三节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 研究成果	109
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工资决定机制的研究	117
第一节 工资决定机制内涵的研究	117
第二节 国有企业工资形成的研究	118
第三节 非国有企业工资形成的研究	122
第四节 农民工工资形成的研究	124
第五节 关于工资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和完善建议	126
第七章 中国工资差距研究 40 年综述	131
第一节 绪论	131
第二节 工资差距的测量方法	134
第三节 中国工资差距的测量与成因分析	137
第四节 中国工资差距研究的评价和展望	154
第八章 中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162
第一节 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发展	162
第二节 教育决策与回报	168

第三节 教育质量与教育发展	175
第九章 改革开放以来职业培训研究的演进和嬗变	184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至 1992 年的职业培训研究	185
第二节 1993 年以来职业培训研究的演进及重点	189
第三节 改革开放 40 年来职业培训研究的嬗变特征	196
第四节 简评和展望	198
第十章 改革开放 40 年来劳动力市场歧视研究的发展趋势	203
第一节 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和测量方法	204
第二节 关于性别歧视的相关研究	209
第三节 关于户籍歧视的相关研究	212
第四节 关于相貌歧视的相关研究	216
第五节 总结	220
后 记	227

第一章 中国就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进展^①

就业是最重要的民生，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解决就业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充分就业也便成了国家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因而，就业问题也就成为中国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改革开放 40 年来，学术界从中国的就业战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新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生育政策调整的就业效应等众多方面，对中国的就业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并实现了一定的理论创新。

第一节 就业优先战略的确立和发展

就业优先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中国就业优先战略的提出，在世界劳动就业发展史上可以算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所谓就业优先战略，就是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我国在 21 世纪初期基本确立了就业优先战略，直接推动了我国劳动经济事业的蓬勃发展。目前，就业优先战略已经深入人心，在新时代，就业优先战略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一 就业优先战略的确立

200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

^① 高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业工作的通知》，是就业优先战略开始酝酿的阶段；2008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基本确立了就业优先战略；2013 年以来，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的颁布，就业优先战略持续深化（袁廿一等，2017）。

就业优先战略，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的选择，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期和社会转轨期，有着深刻的背景（毕京福，2010）：首先，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的速度放缓，就业弹性系数不断下降；失业人员增多；劳动力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减小。其次，就业问题始终是民生的首要问题，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扩大就业，是优先保障人们的劳动权利、充分满足人们对劳动的需求、进一步夯实社会和谐的基础。再次，扩大就业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现城市化进程与扩大城乡就业相协调，方能使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过程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最后，“就业优先”也是我国的就业形势所决定的，从长期看，我国仍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必须采取“就业优先”战略。

关于就业优先战略的措施，有学者认为，要以经济发展促进就业；促进就业创业，重点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实施积极就业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制定提高就业质量的政策与措施（李连根、唐铃，2017）。也有学者认为，应选择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形成促进就业的综合性经济政策体系；持续加大对就业的资金投入，形成公共财政保障、社会各方面多元化投入的机制，对自行创业或自营就业的人员实施多项扶持措施（马永堂，2011）。有学者强调，应扶持第三产业和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马永堂，2016）。有学者强调建立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定合理的经济结构，区域发展战略满足多层次的就业需要；进一步规范就业政策操作流程，简化程序，完善服务，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大限度地为老百姓享受政策提供便利（信长星，2014）。有学者指出，需要改革失业保险制度，发挥其防失业、促就业的功能，包括：扩大失业保险的适用范围；严格失业津贴给付条件；加强失业保险的促进就业功能；改革失业保险制度的新趋势（马永堂，2016）。

学者们还研究了国外就业促进政策对中国就业优先战略的可借鉴之

处。美国的就业战略目标是：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建立一支有保障的劳动力大军，提高工人及其家属的保障水平；创造高质量的工作环境，培育安全、卫生、公平、优质的工作场所；建立一支有竞争力的劳动力队伍，在21世纪的经济浪潮中保持竞争力。英国的总体就业战略目标是：为国民创造平等、有保障的就业环境，提供更多的培训、就业机会，以提高国民自身的就业能力并减少对失业津贴的依赖，提高人们的独立性和福祉。日本在《2010—2020年新增长战略基本方案》中规定了未来十年就业发展战略总目标，即增加需求，推动经济与就业增长，实现国民的富裕生活（马永堂，2010）。

二 新时代就业优先战略的新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精辟阐明了新时期我国就业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业理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们要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发展促进就业，以政策保障就业，努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李云，2017）。

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在稳中向好的同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新特点，逐步形成了新格局：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能力增强；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已基本同步甚至高出经济增速；新经济蓬勃发展，就业渠道更宽；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劳动者就业质量全面提升（张车伟，2017）。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在有效应对就业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拓展就业优先战略的内涵：（1）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让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加大就业支持力度，统筹推进就业岗位创造和就业质量提高（蔡昉，2017）。（2）就业形势的总体稳定，为有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更好条件，也丰富了就业优先战略的内涵。在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始终将就业安置放在重要位置，综合运用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各项社会政策，通过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援企稳岗补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转岗就业和扶持创业等多种方式，保持了就业稳定，有效应对了失业风险，确保零就业

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3) 将就业优先战略与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各项举措结合起来，把稳增长、保就业作为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以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为就业保驾护航（张车伟，2017）。这也是就业优先战略的另一个新内涵。

“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① 因此，就业优先战略更需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劳动者谋福利。在我国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正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过渡，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由数量向质量转移，并处于迈向高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期（袁廿一、陆万军，2017），就业优先战略也需要由就业数量优先转向就业质量优先，并在经济新常态下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推进充分就业的进展。

第二节 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性的探讨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劳动力充分就业的根本途径。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推动就业结构的良性发展，优质的就业结构也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奠定坚实基础。因此，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问题，一直是中国劳动经济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

一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的衡量方法

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在研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或均衡性问题时，主要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就业弹性、结构偏离度作为分析工具。据此与国际理论标准模式相对比，中国产业结构水平基本接近标准模式，与标准模式协调性较好，而中国就业结构则与标准模式不协调特征较为明显，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明显偏高，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偏低，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缓慢（景建军，2016）。

^①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18 日。

结构偏离度分析法。该方法是测算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偏离度，并与钱纳里国际标准模型进行比较分析。从结构偏差系数的纵向发展趋势看，1980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的偏差系数经历了迅速上升、平稳微动、再迅速上升、平稳缓慢上升几个发展阶段（景跃军、张昀，2015）。王庆丰（2010）运用结构偏离度分析，发现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偏差。夏杰长等（2000）在研究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问题时，通过计算历年来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然后与产业结构演变国际标准模式或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后，认为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具有不相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施勇（2006）研究了近十年以来淮安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的变化情况，并基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的视角，对劳动力流动与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分析。张樨樨等（2016）通过收集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相关面板数据，求得两大结构偏离度，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较大，第二、三产业偏离度保持持续下滑趋势。

结构协调系数法。该方法是通过定义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对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整体协调性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基于相似系数经验公式构建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整体协调性较差，协调系数呈现明显的波浪形变动；从地域上看，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部依次降低的梯度分布，省际差异极为悬殊（王庆丰，2009）。

灰色关联分析与时间平移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一种动态发展态势的量化描述和比较方法，这里将产业结构看成一个灰色系统，以就业结构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用关联度来描述因素之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等。王庆丰（2009）采用灰色关联分析与时间平移相结合的方法，基于Moore结构值测算中国就业结构滞后时间，结果发现中国就业结构滞后时间为5年。周建安（2006）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可以分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联程度，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与第三产业的就业状况联系最为紧密，而与全社会的总体就业状况关系甚微；并发现我国就业构成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缺乏协调性，产出结构的调整快于就业结构的调整，这与经验研究或一般规律是相违背的。

还有学者通过构建收敛速度测度模型，测算中国就业结构趋近于产业结构的收敛时间。1978—2008 年，中国就业结构不断向着理想结构收敛，年均收敛速度为 1.24；但是，2008 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理想就业结构的差距仍然高达 38.53（王庆丰，2010）。

二 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的表现

(一)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

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偏差。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一直为负值，而且呈逐渐扩大趋势，表明第一产业现在已成为劳动力净流出部门，且数量有增无减；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在改革开放初期呈直线下降趋势，说明目前采取的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导致第二产业无法吸收更多本应该吸收的劳动力；第三产业是当前结构偏离度最小的产业，说明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正在向均衡状态靠近。

张樨樨等（2016）通过关联产业结构，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较大，第二、三产业偏离度保持持续下滑趋势。景建军（2016）也得出类似结果，即第一产业发展协调性较差，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转移；第二产业发展协调性较好，促进劳动力就业作用明显，但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空间还很大；第三产业发展的协调性最好，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强，产业结构演变和就业结构转换逐渐趋于同步。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差，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一是产业结构偏差，二是劳动就业结构偏差，我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贡献率已出现下降趋势，劳动力就业困难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大因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严重影响了劳动力就业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出现了劳动力过剩与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并存现象（邬爱华、贾生华，2003）。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的偏离度越来越大，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伍海亮，2009）。而且，就业量的提升离不开结构的合理化及其与关联结构的适配协同。张樨樨等（2016）通过实证解析就业结构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揭示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畸形与演化危机。

(二) 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且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结合一般经验与国际比较，并对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偏离度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就业结构变动显著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而且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具有超越第二产业，直接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特征。

夏杰长（2000）研究认为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份额有所下降，而且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的绝对人数迅猛增加，但改革开放以来其相对比重基本趋稳；第三产业劳动力就业的份额偏低，发展相对滞后，但前景十分广阔。周建安（2006）分析发现第一产业就业严重过剩，即存在较多的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的就业不足，还没有发挥其所应有的吸纳就业的潜力；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有待开发。这一就业结构又与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相符——第一产业下降过快，第二产业上升过快，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就业结构演变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也使得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周兵、冉启秀，2008）。

(三)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变动不同步

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在总体上较为迟缓，就业结构的发展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无论从时间序列、空间范围还是三大产业的角度，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的非均衡性较为明显（伍海亮，2009）。中国就业结构不适应产业结构转型，表现在：一是劳动力投入偏向第三产业，但全社会产出的技术和投入结构的变化并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工业对劳动力的净排出效应迅速增强；三是农业生产率提高导致的劳动力减少效应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带来较大压力（何德旭、姚战琪，2008）。

第三节 关于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讨论

一 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总量关系的争论

目前，关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就业数量的研究较多，但至今仍未能达成共识，争议不断，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进

步对就业数量存在损害效应，第二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有创造效应，而最后一种观点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分为两面，它既有促进就业增长的一面，也有抑制就业增长的一面（崔友平等，2013）。

（一）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损害效应”

有人认为技术进步正是“资本深化”过程的表现形式，使企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变，机器取代劳动力，排斥大量富余人员，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就业压力增大（张军，2002）。机器人应用的不断普及可能引起大规模失业，且伴随自然力慢慢取代人力，人类面临的就业压力将愈加严峻（赵磊、赵晓磊，2017）。

在实证研究方面，有学者基于中国 31 个省区市截面数据，分析认为技术进步的发展使得资本和劳动形成替代关系而导致就业减少（姚战琪、夏杰长，2005）。有人根据工业部门的属性不同，按照资源密集、资本密集、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于不同属性的工业部门的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部门之外，技术变化均对其就业有负向作用，技术效率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的就业有负向影响（叶仁荪等，2008）。也有人在利用 DEA 方法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分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的增长以及对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表明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在我国表现为就业挤出效应（朱轶、熊思敏，2009）。也有人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即分别考察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中的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工业部门（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并未带来就业的增长，而服务业（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反而对就业有抑制作用（宁光杰，2008）。

（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创造效应”

有关学者认为科技进步有促进就业量的增长和让劳动者意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的双重优势，因而，中国应重视科技进步的正向作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就业数量的促进作用（翟群臻，2005）。在研究分析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就业这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发现技术进步是就业增加的重要原因，对缓解就业压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博、温杰，2010）。有人采用 1985—2008 年的行业面板数据，对工业行业中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进行分析，建立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整体就业具有促进作用（胡鞍钢、盛欣，2011）。也有学者基于 18

个行业 2003—2007 年的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城镇青年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发现引进技术创新每增加 1%，青年相对于成年人获得城镇就业岗位的优势就增加 0.1%（崔友平，2001）。

（三）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双面效应”

技术进步一方面对劳动产生排斥作用，出现了“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同时，技术进步也会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拓宽就业领域，并增加就业量（龚玉泉、袁志刚，2002）。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但应从长、短期来区分。短期来看，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扩大了机器使用范围，从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排斥效应，但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能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引起消费结构的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促进就业增长（陈泽聪，2001）。有学者通过分析 1993—2008 年制造业 25 个行业的就业情况，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 模型）得出技术进步在时间维度上对就业的影响，即技术进步短期内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长期来看影响不会很大（甘梅霞、刘渝琳，2006）。也有学者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认为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对就业不存在稳定的替代关系，通过工资对劳动力价格的调控，能够有效促进技术进步的长远利益，并避免短期就业的剧烈波动，从而在推进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发挥中国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叶仁荪等，2008）。

二 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结构的关系的讨论

就业结构应是不同类型劳动力相对数量变化的体现，最突出的表现是拥有高技能劳动者与拥有较低技能的劳动者的工作职位数量的变化。技术进步通过对劳动生产率、教育年限、技能培训等产生影响，由此产生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带来收入变化、工作转移以及劳动市场的调整等。

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包括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动两部分，其影响集中体现在产业结构方面，它让就业结构有着向高新产业化发展的趋势，而缓解结构性失业要加大对劳动者教育和技能等方面培训。此外，政府也应当采取必要的举措，抑制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挤出作用（刘文军，2011）。在对劳动力素质结构的影响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随着技术进步，社会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并减少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因此劳动者会更加重视对自己人力资本的投资以